

再探曹县：一个内陆农业县的“出圈”之谜

本报记者闫祥岭

5月中旬，一位年轻主播在短视频中，用方言喊出“山东菏泽曹县666”，随即引发众多创作者模仿。一时间，“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北上广曹”等花式调侃涌进互联网，也意外带火了这个内陆农业县。

曹县“出圈”已有数月，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再次实地探访发现，在当地厚重传统文化传承下，乡土文化、乡村审美与现代商业碰撞、交织，经过一个个默默无闻又偶有闪光的个体催化裂变，成长出曹县别具一格的绚丽。

独特的文化基因

曹县所在的菏泽市，古称曹州，是著名的书画之乡、戏曲之乡、民间艺术之乡。曹县自身也有“中国泡桐加工之乡”“中国木艺之都”等诸多头衔。

遽然“出圈”的曹县，最吸引公众眼球的，是其左手棺木生意，右手汉服、演出服生意，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细究这两个领域，都与当地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没有高大的厂房、掩映在329省道旁一片树林间，曹县云龙木雕工艺有限公司非常不起眼，在当地却人尽皆知。

1987年建厂，1995年开始给日本的棺材厂做配套，2000年开始给日本客户提供成品棺材。30多年的时间，这家企业从接外贸订单，到利用电商渠道销售，不声不响中，年产值从300多万元提升到1.6亿元，员工从50多人增加到500多人，成为山东省林业“龙头企业”、国家级非遗“曹县木雕”传承单位。

“我最近每天都要和好几位客人聊，有的是专程慕名而来。”在曹县孙老家镇老厂区内，公司总经理李如启告诉记者。

作为曹县“出圈”的重要内容支撑，李如启并未感到惊喜。他说：“我们早就在这个行业引领风尚了，品质、价格、新产品研发等，我们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单从出口日本的棺材来说，2000年，这家企业一个月的产能不过两三千套，当前月产能已接近三万套。

记者在企业展厅看到，包括棺材在内的各类木雕产品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介绍，与一般木材加工不同，融入雕刻技艺的产品有更高的附加值，但木雕是个耐心活，一般人要两三年才能学有小成，讲究的是干净利落、自然且有立体感。

在生产车间里，工人的刻刀一刻不停，桐木碎屑间歇落下。桐木质地轻、易燃烧、难变形、花纹美观、寓意吉祥，是曹县棺木产业发展的独特资源。

李如启认为，曹县木雕技艺代代传承，是当地企业闯入国际市场的关键要素。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图案以龙凤为主，现在虽有改进，但基本上保持原来的风貌。从审美上来说，既符合东方审美，又契合现代人的感受。

在当地，云龙木雕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是同行眼里的“香饽饽”，有企业曾一次挖走了8位木雕师傅。这家企业培养的雕刻师，支撑起了当地全行业的艺术底色。

李如启乐见行业发展，对人才流动，他自有底气。家族几代人从事这一行业，技艺传承已超百年。

“从我爷爷辈开始，当年是走街入户，雕得快慢、好看与否，都在七里八乡的口碑里。现在传承到第四代了，我这代主要做日本市场。”他说。



2020年12月11日，在山东省曹县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学校实训基地，一位学生在直播销售汉服。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近些年来，曹县先后获得“中国柳编之乡”“中国杨木加工之乡”“中国泡桐加工之乡”“中国木艺之都”“国家家居产业示范园区”等称号。

目前，曹县是全国最大的桐木加工生产基地、出口创汇基地和集散中心，全国最大的木制品跨境电商产业带，棺木、牌位、佛衣等三种工艺品出口量均为全国第一，形成了国内同行业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棺木产业集群。

乡村审美拥抱商业文明

虽然是位于鲁西南的传统农业大县，但曹县从来不缺商业气息。从走街串巷的“走商”，到出口海外的外贸订单，再到当前用电商整合当地产业，曹县的走红，与商业文明息息相关。

曹县对传统文化及传统技艺的传承，同样体现在汉服、演出服领域。电商老板李东直言，用电商做服装的地方很多，“但其他地方搞不出我们这里的味道”。

“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在农闲时开始‘跑布景’。”在曹县大集镇电商产业园里，李东告诉记者。

一块块的布，用缝纫机缝在一起，当地画师用土法配出颜料，在布上手工绘画，一个摄影背景布就制作完成。“跑布景”的乡亲们将其背在身上，走南闯北去影楼推销，曹县乡土画师的作品，挂在天南海北一面面的摄影背景墙上。

爷爷辈开始，李东家就走街串巷做点磨菜刀、修鞋子的小生意，他小时候，也曾借着煤油灯的光，帮爷爷数零钱。“跑布景”给童年的他留下印象最深。

一些影楼淘汰了旧的背景布，李东的父亲就拿回家，挑些好看的挂在家里做帘子。李东经常在同字格作业本上模仿帘子上的画，画点亭子、宝塔之类。

初中毕业后，没有专门拜师学画，李东就能独立在背景布上绘画了，父亲背着这些作品去

“跑布景”的时候，爷俩心里都很骄傲。

“父亲那一辈是高峰期，那时附近差不多几千人在各地‘跑布景’，背景布上是众多农村画师的作品，现在仍然有人做这个生意。”李东说。多年来，当地农民有绘画传统，农民画作曾出口到国外。

父辈“跑布景”，是靠脚跑出来的生意；今天，电商名人李东已习惯点击鼠标打理生意。2009年，他决定改变老一辈的“生意经”，用一台二手电脑开了网店。

2011年冬天，龙年来临之前，有客户向他求购生肖龙的儿童演出服。这种大量定制，在当地是第一次。李东手里并没有现成模板，他和爱人一起，查阅了各种资料，自己设计、定型，最后用胶水黏出来一个试验品。

“那年冬天很冷，我借了一个傻瓜相机，让四岁的儿子套上服装，先在被窝里暖和着，我调整好角度，说开始拍，儿子就拿掉被子，躺在床上让我拍，拍完后再钻被窝暖和。”几次拍摄，改进后，客户满意了。这款自己设计的生肖服，很快成为“爆款”，销售热度让他措手不及。

“这是全曹县第一款自主设计的爆款儿童演出服。”李东说。看到不少孩子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在电视上表演节目，他备受鼓舞，电商事业也随之蒸蒸日上。

随后，李东想把周边的人激活。他开始免费培训乡亲们，最初不少人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之后，有200多人因此走上了电商之路。

目前，李东的团队每年都推出多款新设计的产品。他的企业是“曹县电商扶贫就业点”，他本人是“菏泽市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

从热销的儿童演出服装，到边学习边制作边销售汉服，给曹县电商带来全国关注度的服装行业，正经历一场不大不小的转型。

“90后”孙康佳2014年退役回到大集镇

孙庄村，第二年就开始在网上销售儿童演出服装。但儿童演出服装市场蛋糕虽大，竞争却也越来越激烈。

孙庄村村支书孙学平介绍，孙康佳与身边的年轻人一样，从贴吧、汉服群学习基础知识，逐渐知道飞鱼服、齐腰襦裙，也了解到更多市场需求——汉服的利润比儿童表演服装高，且市场需求常年稳定。

针对市场消费偏好，孙康佳的团队开发出几十款产品，并在花型、版型方面申请多项专利。意料之中，一些改良款式的销路越来越好。

短短几年，曾经贫穷的大集镇，基本形成了演出服装的设计、生产、销售全产业链，聚集起全国最大的儿童表演服装产业集群，并逐渐向汉服产业延伸。

目前，曹县约有汉服及上下游相关企业2000多家，原创汉服加工企业超过600家，销售额占到全国同类市场的近三分之一。

2020年，曹县网络销售额突破156亿元，电商企业超过5000家，网店6万余家，电商带动35万人创业就业，带动5万返乡创业人员，是全国第二“超大型淘宝村集群”和“江北最大的淘宝村集群”，网络零售额和快递物流包裹量两项连续三年位列山东省第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说，电商突破了地理条件的限制，为小乡村创造了大市场，进而推动乡村经济生活的重组，建构起一个更为开放的线上线下互动的经济秩序；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让政府服务融入乡村发展大局，扮演起关键的组织者角色，为社会和市场提供政策保障。

机遇和压力

能否稳妥把握“出圈”带来的高知名度，能否充分利用电商的综合带动作用，实现从

经济发展到社会治理的全面提升，从官方到民间，曹县都察觉到了机会，也感受到了压力。

当地政府主动转变职能，让政府服务融入电商发展大局。曹县电商服务中心主任兰涛介绍，曹县形成南部表演服饰和北部木制品两大产业集群，当地一直加强扶持引导，谋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动电商发展。

2018年，曹县为加快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点上带动，面上开花，特色鲜明”态势，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

“要求全县在推动‘互联网+品牌’建设、电商产业规模化发展、电商人才培养和引进、深化产业园区发展、开展‘新外贸’合作、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全面发力。”兰涛说。

为加快开拓汉服市场，引导当地部分企业从儿童演出服向汉服转型，去年3月，曹县县长梁惠民身穿汉服，在网上开启“汉服直播”。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何宇鹏说，农村电商让原本偏远的、欠发达的地区有了发展的空间和余地，并把现代的生产方式植根于农村，这对传统产业、传统乡村，“实际上起到复兴的作用”。

走入曹县的众多村庄，电商因素进入了当地几乎每个乡村。专家认为，传统农耕价值之外，乡村依托电商发掘出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提升了传统产业潜力，从而重新获得产业支撑，乡村的经济社会价值得以重视。

“发展电商给村子带来很多人气。”大集镇丁楼村电商带头人任庆生说，仅仅几年前，丁楼村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但是现在全都回来了，有的甚至放弃了很好的工作机会也要回来创业。

不仅本村人口回流，电商带动的产业发展让丁楼村成为周边群众的就业聚集地，来该村打工的人数达到3000多人，超过本村人口2倍以上。

电商崛起吸引的返乡创业人口，正在重塑整个乡村的秩序。大集镇党委书记李涛说：“返乡青年不仅成为致富带头人，也积极参与村务管理，给基层组织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乡村治理更加高效有序，农民对未来更加自信从容。”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支撑、市场消费需求、政府引导扶持、创业者艰苦奋斗，共同推动着农村群众利用电商发家致富梦想的实现，深刻改变着乡村面貌，重塑着乡村生产生活图景。

曹县所属的菏泽市，是著名的中国牡丹之都和武术之乡、书画之乡、戏曲之乡、民间艺术之乡。记者观察到，木雕、绘画、戏曲早已融入当地的血脉传承，涵养着一方底蕴，维系着一方产业。

传承着厚重的文化传统，抓住了现代商业文明契机，当地人有底气面对“出圈”的种种喧嚣乃至质疑。分析人士认为，曹县“出圈”不是偶然，是原有家底搭上了互联网快车。新时期的曹县人，把自己悠久独特的文化传承与现代商业文明结合，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成为今天“出圈”的财富现象。

“曹县出圈，我觉得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曹县是有家底的，又搭上了互联网快车，大家都有互联网运作的思维。综合因素之下，带火了曹县。”梁惠民说。

环评报告弄虚作假，“漂白”污染项目挣昧心钱

一些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成为不法企业“排污保镖”

本报记者郭强、郭慧颖

通过围隔稀释，干扰国控水质监测点采样环境，造成水质改善假象；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长期“吃药运行”，在尾端大量投加COD去除剂……近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到云南、河南、广西等地反馈督察情况，其中不乏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参与弄虚作假的案列。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引入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是我国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但在部分地区，一些本应成为环保卫士的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却凭借其专业背景让排污更隐蔽，成为不法企业的“排污保镖”。

治污与排污企业“同流合污”

相隔大半年的两份环评报告，有10多组数据完全一样；项目一墙之隔有居民住房，报告中却只提百米之外的村庄；公众参与座谈会未召开，报告书已出现座谈会内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环评机构在编制环评报告时照搬照抄、避重就轻甚至凭空捏造，致使环保“第一道防线”失守，污染项目“漂白”上马。

今年5月，河北一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环评师许某，被生态环境部列入重点监督检查

名单。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许某共编制22份环评报告书、509份环评报告表，其中仅今年3月就提交了22份环评文件，项目地址分布在黑龙江、辽宁、新疆、河南、湖南、河北、云南、内蒙古、四川等多个省市区。

在线自动监测设施是监督排污行为的“千里眼”，但一些环保运维公司却通过种种障眼法，帮助排污企业掩盖偷排行为。今年，浙江绍兴市生态环境部门检查发现，某纺织印染企业一外排泵出口管道处设有一处旁路，接一根带阀门的UPVC灰色管道，管道内有透明水体，外排废水COD浓度为968mg/L，而透明水体COD浓度仅为16mg/L。经查，这家企业委托某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干扰在线自动监测设施。

环保设施由建设单位自主验收，是生态环境领域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好服务企业的重要举措，但有的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却在验收中弄虚作假，帮助排污企业蒙混“过关”。

浙江某县生态环境部门在打击自行验收企业串通环保技术机构出具虚假验收报告的专项行动中发现，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委托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进行环保设施自主验收，后者明知企业有高浓度污染指标的生产废水未经处理外排，却未采集，而是用低浓度的生活污水代替企业的外排废水。

专家表示，环保卫士成“排污保镖”，专项治理变专业“护污”，其危害更甚。

为了承揽业务一味迎合“金主”

多位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干部坦言，当前，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多，竞争激烈，一些服务机构为了承揽业务一味迎合“金主”，甚至不惜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编造虚假报告、篡改监测数据等。

“有些非法排污企业只算投入小账不算生态大账，与动辄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元的治污投入相比，在环评、监测、验收等环节做点手脚无疑更‘划算’，一些环保服务机构抓住排污企业这一需求，双方一拍即合、同流合污。”江西某县生态环境局一位负责人表示。

第三方环保服务市场本身也存在鱼龙混杂的乱象。记者了解到，某环保服务企业在没有环评编写资质的情况下，擅自承揽环评业务，随后转包给一名无资质的人员编写，最终挂靠一家有资质的企业提供报告。经查，这份报告存在危险废物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值和大气污染源计算过程及结果抄袭、弄虚作假等情况。

业内人士称，一些有环评工程师的机构

为了承揽更多业务，“经常雇没有资质的人来编制报告，许多项目环评工程师没怎么参与就签字了”。

即使遭遇处罚，仍可以通过“换马甲”钻监管“漏洞”。一些基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人表示，很多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都是中小企业，遭遇处罚后，往往换个“马甲”又重生。

记者在“爱企查”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查询发现，不少环保服务企业法人代表及股东名下，有几家甚至二三十家关联企业。它们中有的曾因涉嫌弄虚作假被生态环境部通报点名，一些环评企业还被列入重点监督检查、限期整改名单甚至禁止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黑名单”，但其关联企业仍在开展业务。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第三方环保服务市场资金、技术门槛都不高。“对于一些小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来说，购买有关设备仪器花费不到100万元，工作人员只要通过简单培训就能上岗开展业务。”

打击“排污保镖”守护生态环境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

担连带责任。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更是首次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弄虚作假”行为纳入刑法定罪量刑。

南昌大学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院长吴代赦建议，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进一步完善造假人员行业禁入制度，如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出现明显违法违规行为，其法人代表应列入行业“黑名单”，禁止其开展相关业务。

一些基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人表示，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专业背景，让非法企业的排污行为更隐蔽、逃避监管更专业，对执法的专业化水平也提出更高要求。今年年初，生态环境部通报了一起案例：陕西一家环保公司运营的污水处理厂使用一种“COD去除剂”处理污水，这种“COD去除剂”主要组分为氯酸钠，并不能真正去除水中的COD，只是掩盖了COD的测定过程，使得COD的测定结果偏低。

此外，守护好生态环境，必须进一步规范第三方环保服务市场。专家建议，各地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环保服务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价压价现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减少排污企业“谁保我过关，我就让谁做”的可能性。